

當前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與措施

汪學文

一

邇來，國際間對於中國大陸情況，正流行着若干似是而非的論調，其中主要的一種，就是誤認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業已緩和，有關的各種措施亦已放寬。這一種論調，乃基於一個大前提，即誤認毛共的「文化大革命」業已結束或行將結束，大陸局勢已從混亂趨於平靜，從動盪趨於穩定。這種看法，顯然與事實不符，毛共中央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已經明確地指出：今年將是「文化大革命鬥、批、改運動」更加深入的一年，要在政治思想戰線、文化教育戰線、經濟戰線、和上層建築各個領域，抓緊「革命大批判」，進一步批判「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思潮」，以及肅清「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餘毒」。這不僅證明「文化大革命」尚難結束，而且顯示若干老問題仍然複雜和難於解決。

當前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與措施，其所以令人產生緩和與放寬的錯覺，大約是基於這些現象：毛共將冷藏已久的「團結、教育、改造」口號重新提出，而且若干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已漸漸地活動起來，有的曾派往海外「亮相」，例如物理學家周培源於去（五十九）年十月隨代表團赴北韓訪問；有的曾在報刊發表文章，公開「說話」，例如數學家華羅庚、力學家錢偉長於本（六十）年二月間先後在香港匪報撰文，為匪宣傳；有的則紛紛「復職」，例如上海的科技人員和廣州的專家教授等是。但是，這些都僅是表面現象而已，他們真的恢復自由了嗎？他們真的具有發言權嗎？他們能保持原有的學術地位嗎？他們能得到應有的尊敬嗎？要了解這些問題，祇看表面的現象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透視毛共政策的實質、和各種措施的真相。

如果說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業已「緩和」，那末這種「緩和」從「九

當前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與措施

大」就已開始。五十八年四月，林匪彪在「九大」作政治報告時說：「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落實。黨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識份子政策、幹部政策，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對待羣衆組織的政策，對敵鬥爭政策，經濟政策等等，總的題目就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又說：「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總之，批判思想，給以出路。把這一部份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於分化瓦解敵人」。「九大」的公報也說：「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鞏固工農聯盟，對知識份子進行再教育，爭取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共同對敵」。很明顯，林匪彪把知識份子政策置於各項政策之首，乃是表示知識份子問題仍然很嚴重，必須優先解決；他提出「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批判之後，或看或用或養，並將「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似乎顯示出毛共在知識份子政策上已決定放寬「鬥、批、改」的尺度，用「爭取和團結」代替「打擊和鬥爭」。所謂「鬥、批、改」，就「文革」任務而言，鬥是對人，批是對思想意識，改是對法令規章制度；就知識份子而言，則「鬥、批、改」就是「打、罵、辱」。林匪彪強調對知識份子或看或用或養，都要經過「批判」，這表示「鬥爭」雖可暫停，「罵和辱」却仍不可免，所謂「放寬」，如此而已。而且，這還祇是文字上或口頭上的「政策」，一旦「落實」，又要變質。例如僑中山大學在「落實這項政策」的過程中，從領導到羣衆都存在着各式各樣的「活思想」，有的對「舊知識份子」有「全盤否定」的傾向，對改造他們缺乏信心，有的主張「寧左勿右」、「寧嚴勿寬」、「寧推勿拉」；而毛宣隊對於犯過「錯誤」的教師和幹部，則採取「一批、二清、三破、四幫、五用」的措施：一批，就是徹底批判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二清，就是弄清他們的「政治歷史問題」；三破，就是要破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反動的學術思想體系」；四幫，就是在批的基礎上，積極做好思想教育 and 政策教育工作，「幫助他們認識和改正錯誤」；五用，就是在「批、

清、破、幫」之後，「利用他們的一技之長」，給他們安排「適當的工作」（註一）。這就是說，「一批二用」政策落實時，還要增加「清、破、幫」等步驟，而這些步驟，實際上就是繼續清算。

五十九年三月，毛共「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了一篇題為「建立無產階級知識份子隊伍的偉大綱領」的文章，這篇文章雖然署名為「安徽省革命委員會寫作小組」，而且內容主要是闡釋毛曾於四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但是却透露了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這些政策是：

①在進行再教育的過程中，對於同工農兵結合得好、並有所發明創造的知識份子，應當加以鼓勵，用他們的榜樣來教育其他知識份子；

②對於「擁護社會主義革命的年老的知識份子」，要團結他們，幫助他們進步，安排他們的生活；

③對於知識份子中「犯錯誤的人」，也要着重於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

④對於知識份子中那些「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在他們有了覺悟，並得到羣衆的「諒解」以後，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並鼓勵他們到工農羣衆中去，改造世界觀；

⑤對於「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總之，「批判思想，給以出路」。

這些政策，與林匪彪在「九大」所報告的，沒有什麼不同，特別是第五項政策，內容完全一樣。但是，這篇文章却另外強調了兩點：

第一、毛匪澤東對知識份子提出的「走馬看花」、「下馬看花」、和「安家落戶」這三種與工農相結合的方式，仍然普遍適用；特別是對廣大知識青年來說，「安家落戶」是一種最重要的方式。

第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其中必然貫串着「激烈的階級鬥爭」，鬥爭的中心，是「爲誰服務」的問題；「我們必須準備用很長的時期進行思想戰爭上的大批判。舊的毒草並沒有都批判透，而即使批判了，還會出現新的毒草，還得再鬥爭。」

這兩點，充分顯示出毛共並沒有放棄對知識份子的「下放勞改」和「不斷鬥爭」的政策。

同年七月，毛共「紅旗」雜誌第八期發表了一篇偽清華大學毛宣隊撰寫的題為「爲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的文章，也提到了知識份子政策。因爲學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而教師問題，則是知識份子問題的重心。偽清華大學對於原有教師的政策，主要的是：

①對於原有教師的大多數，只要抓緊政治上的再教育，業務上的再學習，就能繼續任教；對極少數實在不行的，也要給予「出路」，進行教育，安排「適當工作」，繼續考察；

②爲了幫助教師儘快適應「社會主義大學」的需要，必須堅持「在使用中對他們團結、教育、改造」；那種「改造好了再用」的說法，實際上「既沒有看到知識份子的革命積極性，也沒有看到知識份子改造的長期性」；

③針對教師過去長期「三脫離」的弱點，組織他們到「三大革命」（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實踐中去經受鍛鍊，參加「創辦試驗農場」、「對口下廠」、「輪換勞動」，進行「教改實踐」，「在條件比較艱苦的環境下改造思想」。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往往在對業務知識的看法上反映出來，必須徹底改造各個業務領域。教師參加「三大革命鬥爭實踐」，必然深刻地觸及他們中間一些人靈魂深處根深蒂固的「知識私有」、「理論至上」、「洋奴爬行」、「個人名利」等「舊思想」，以利於加速他們的思想改造。

④知識份子世界觀的徹底轉變是不能自發完成的。環境的變化只是爲他們的改造創造了條件，還必須本着「抓緊、抓嚴、抓細」的原則，針對活思想，進行再教育，用他們中的「先進典型」教育他們自己，啓發他們「自覺革命」。對他們思想上的動搖與反覆，因勢利導，做耐心的認真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世界觀的改造。對他們的「錯誤思想」，「進行說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評，加以糾正」。

在這些政策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把「改造好了再用」的原則，改爲「邊改造、邊使用」的原則。這是最毒辣的手法，因爲「在使用中進行教育和改造」，實際上就是「既利用，又鬥爭」，其痛苦可想而知。

同年九月六日，毛共在其「九屆二中全會」中通過偽「憲法修改草案」，其中「總綱」第十二條乃是有關文教的政策，這一條的原文是：

「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科學研究，都必須爲無產階級政治服

務，爲工農兵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在各個文化領域內，毛共對所謂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其「專政」的對象，自然是知識份子——包括所有的新舊知識份子。按照毛共的說法，舊知識份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即使有些人是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但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新知識份子雖然是中共自己培養出來的，有的還出身於工農家庭，但在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毒害」下，其世界觀基本上也是「資產階級」的，因此，他們全都成爲毛共「專政」的對象。

所謂「全面專政」，應該有兩種涵義：一爲組織的，即在整個文化教育領域中，對任何一個系統、任何一個部門，都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越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越要實行「專政」。所謂工人階級佔領和領導學校，就是對學校的「專政」；另一爲個人的，即對知識份子個人從政治上、經濟上、生活上、以及思想上，實行「全面的專政」，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也不容許他們有屬於個人的「思想自由」和「事業理想」。

至於「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科學研究，都必須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爲工農兵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其基本精神，乃是企圖使整個文教事業達到「階級化」和「勞動化」。

毛共認爲對知識份子的「專政」，必須是長期的，而「專政」的目的，則在於改造他們的世界觀。亦即通過所謂「再教育」的過程，採用「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雙管齊下的辦法，企圖把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意識，從原來「資產階級的立場」轉移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達到「革命化」和「勞動化」。而在「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中，知識份子所實際受到的則是肉體折磨和精神凌辱的雙重迫害。

從以上各種資料看來，無論是「九大」的政治報告，還是偽「憲法修改草案」的條文，其有關知識份子的政策，在實質上並無緩和或放鬆之處。唯一的支票，就是「給以出路」，但這是有條件的，必須經過清查和批判；而且即使僥倖被起用，仍處於「被支配」的地位，仍得繼續接受批判和監督，仍得謹慎將事，否則動輒得咎。

林匪彪所說的「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總之，批判思想，給以出路」，目前已逐步付諸實施。其中「一批二看」的「看」，乃是繼續考察，表現好就「用」，就予以奴役，表現不好就「養」，就進行勞改。因此，當前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實際上僅爲兩種：一爲「一批二用」，即在改造中使用，在使用中改造；一爲「一批二養」，即繼續清算和批判，不予起用。

毛共的這兩項政策，或用或養，都要經過批判。批判的方式很多，主要的不在會議上以口頭批判，和在報刊上以文字批判。自「紅衛兵運動」及武鬥進入高潮後，毛共報刊上的「點名批判」反轉趨沉寂，「九大」以來，僅對「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楊翰笙）繼續作重點批判而已。據說，大陸文藝界有人反對繼續清算「四條漢子」，認爲他們是「死老虎」，而且已經「批判得差不多了」。毛共指這種論調就是從「四條漢子」的「餘黨」那裏放出來的，目的在於「蠱惑人心，瓦解羣衆鬥志」，以便他們「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並強調對他們這種想暫時「裝死躺下」、「保存實力」，圖謀「東山再起」的陰謀，「必須及時揭穿，並要鳴鼓而攻之」。這說明大陸文藝界對毛共的反抗仍然普遍存在。毛共對「四條漢子」的批判，內容很廣泛，主要的是指他們在三十年代拋出「國防文學」、四十年代拋出「暴露文學」、五十年代拋出「全民文藝」，六十年代則利用各種鬥爭形式向毛派進攻，及「文革」期間被揪出後，他們的「餘黨」仍在天津「演黑戲，開黑會」，企圖進行「反革命奪權」。因此，毛共認爲「四條漢子」不是「死老虎」，僅僅是「落水狗」而已。毛共在批判「四條漢子」時，又進而大舉清算孔子，而且承認，甚至到了現在，「孔老二」還不是「死老虎」，對毛共否定中國歷史文化的陰謀還具有威脅性。毛共這種認爲孔子「陰魂不散」、不是「死老虎」的論調，對於若干「中共專家」認爲「毛共繼承了孔夫子傳統」的荒謬見解，實際上也是一種間接批判和否定。

毛共的「點名批判」，除「四條漢子」外，曾對楊獻珍繼續進行批判，以配合其「學哲學運動」。最近，毛共突又再度攻擊前僑北京大學副校長蔣伯贊。毛共以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展開「文革」的序幕以後，立即以吳晗爲基本對象，從兩方面進行攻擊，一方面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吳晗、鄧拓、和廖沫沙的雜文集「三家村札記」；另一方面則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吳晗和翦

伯贊的史學觀，指他們二人為堅持「資產階級史學方向」的「二帥」，並視為「史學革命的絆腳石」。對於翦伯贊的批判，當時係以「歷史主義」為主。「歷史主義」的提出，其目的在糾正大陸史學界在毛共控制下過份強調「階級觀點」的偏向，並反對毛共所提出的「厚今薄古」、「以論帶史」、以及「打破王朝體系」等口號和論調。對於「打破王朝體系」問題，翦伯贊反對最為激烈，他認為王朝稱號乃是「歷史事實」、「時代符號」，以及「中國歷史在其發展過程中的里程碑」，應該尊重並沿用，「不管按照什麼體系編寫中國通史，都不應該從中國歷史上刪掉王朝的稱號」。如今，毛共對翦伯贊的批判，則以「讓步政策論」為中心。所謂「讓步政策」，乃大陸史學界根據列寧所說「改良就是在保持統治階級統治的條件下從統治階級那裏取得讓步」一語而提出，其實際意義就是指歷史上某些朝代所實行之仁政德治，如輕徭薄賦、賑災免役、政簡刑輕等愛民和便民的政策與措施。翦伯贊在論及「讓步政策」時，曾謂「明代統治者認識到過份地壓榨人民會引起暴動」，此語無異警告毛共不得實行暴政，因而毛共指其為射向毛澤東「革命路線」的「一顆毒彈」。(註二)

從上述各種批判看來，「四條漢子」、以及楊獻珍、翦伯贊之流，其與毛共之間的矛盾，都是「敵我矛盾」，而且不可能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因此，他們都是毛共「一批二養」的典型對象，或將不予起用。

在「一批二用」方面，目前毛共已經起用的高級知識份子，主要的有周培源、華羅庚、錢偉長、錢學森等。周培源原任僑北京大學副校長，現任僑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職稱不同，地位一樣，等於「復職」。錢學森和錢偉長現都担任僑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小組成員；華羅庚則担任僑中國科技大學教育革命小組成員，並仍兼任僑中國科學院的工作。二月間，華羅庚和錢偉長等，都曾在香港匪報上發表文章，錢偉長說：「就是像我這樣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就好像換了一個新人」(註三)。這證明錢偉長在「文革」期間會受到相當的批判和改造；華羅庚說：「解放前，我曾經去過美國」、「被美國社會表面的所謂繁榮現象和虛假所謂『美國文明』迷惑過」；「以往，我『關門研究』、『閉門教學』，每年能有一兩項成果，解決個把實際問題，培養出三、五個學生，就以爲了不得了；而現在把科學直接交給廣大工農羣衆，情況就大不相同了。」(註四)

華羅庚在「文革」期間曾受批判，被指爲「反革命兩面派」，因而他於五十八年六月及十一月曾先後在報刊發表文章，進行自我批評，承認思想落後。兩文均謂劉少奇派利用他時，把他當作工具，不利用他時，則把他當作犧牲品，欲置之死地。字裏行間，充分顯示出其不滿毛共之情緒。而這次發表的文章，表面雖係爲匪宣傳，實際上可視之爲第三次自我檢討，看來仍言不由衷，其於此時撰寫此文，當係出於毛共的授意。

由上可知，當前毛共「一批二養」的對象，大部份是文藝和社會科學工作者，而「一批二用」的對象，則大部份是教師和科學技術工作者。

四

毛共竊據大陸以後，即宣佈對知識份子採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但是二十年來，其對知識份子却從來沒有誠心地去「團結」。毛匪澤東認爲：「矯枉必須過正」、「團結必須鬥爭」，因而其實際執行的却是「又利用、又鬥爭」的政策。如今毛共所提出的「邊使用、邊改造」的原則，正是這個「又利用、又鬥爭」的一貫政策的體現和總結。

毛共的政策，一向具有兩面性，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文件上是這樣，落實時又是那樣，令人難以捉摸，「團結、教育、改造」政策之變爲「又利用、又鬥爭」政策，祇是其中一例而已。此外，毛澤東於四十六年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曾說：「我國的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份子爲它服務。」「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善於團結知識份子，用生硬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適當的干預那些不當干預的事務，所有這些缺點必須加以克服」。據說這幾句話當時會使不少知識份子「感激涕零」，但是毛語猶未了，就展開了「反右派鬥爭」，對知識份子大肆鎮壓。又如毛共中央於五十五年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曾規定：「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是事實上根本沒有給他們以「申辯」和「講道理」的機會，(——下轉第80頁——)

於停頓的狀態。上述的情事在金市剛果也會發生過，一九六七年，剛果政府收回了由二千五百名比利時技術人員所經營的卡坦加聯合礦業公司，才發現以本國現有的人力、技能實無法使其繼續生產下去。這些事件都足以證明非洲元首為打擊殖民勢力而逞一時之快却無法預見其產生的不良反應，剛果即為此喪失了六億美金的收入。又如阿爾及利亞產油遠比利比亞為早，但時至今日其石油生產僅為比利比亞的半數，這應歸因於一九六七年將外資探油、採油權的國有化。再以迦納和埃及而言，恩克魯瑪國有化措施實行後，所有國營企業的收益均不及以前的一半；納塞收回蘇伊士運河或許是一項成功，但是其餘的顯然也都失敗了。國有化實施的結果除了造成人材的匱乏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對外國投資的打擊，任何資本家在選擇投資場所時都必需先考慮安全性，其次才是獲利的多寡，面對國有化措施此起彼落的非洲大陸，任何資本家都會躊躇不前，這不僅使非洲國家的企業無法振興，國民就業率也無增加的機會，連帶影響的自然是非洲國家迫切需要發展的經濟建設。

陸 結論

國有化，無論是否有法理上的依據，也不管是否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顯然勢必在非洲各國繼續發生。在所有實施過國有化政策的非洲國家中，以阿爾及利亞、埃及、幾內亞、坦桑尼亞和尚比亞實施的次數最多，範圍也最廣，因此似乎可尋出一個跡象，即這些國家均為激進的左傾國家，也都是受俄、匪影響較多的國家。匪、俄在全球顛覆、破壞的陰謀無所不用其極。非洲國家在久經殖民統治而解放後，盲目的反殖民主義構成了一個政治性及經濟性的弱點，這正是俄、匪苦苦尋求的滲透良機。國有化並非非洲所獨創，亦非僅見之於非洲，然而非洲國家對此政策的認識不清，運用不當，除招致了對本國經濟的打擊，更為匪、俄陰謀所利用。匪、俄為分化非洲國家與西方的關係，除竭力支持非洲反殖民情緒外，並勸誘非洲領袖清除國內任何具有殖民色彩的事物。國有化政策之所以流行於今日非洲，實為匪、俄陰謀煽動有以致之，這項措施如果為非洲普遍採行，非但非洲國家與西方關係將趨惡劣，而外資不來，非洲國家却急需援助，只有轉向匪、俄求援一途，這正是匪、俄夢寐以求的結果。由上述看來，西方國家不能不察，非洲的政治領袖尤當痛切反省，以避免再有為逞一時之快而將國家前途斷送的情事發生。

——上接第72頁——而且完全採用武鬥，使他們「威風掃地」。這項「決定」又規定：「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於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但是，這些人在「文革」期間，也毫不例外地遭到或多或少的批判和鬥爭。類此兩面手法的實例，不勝枚舉。

因此，大陸知識份子與毛共之間，始終存在着相當的矛盾，而這些矛盾，正隨着時間的發展，愈來愈深刻，愈尖銳。毛共對於知識份子，二十年來祇有利用和鬥爭，沒有信任和善待，而知識份子如今業已澈底覺醒，對於毛共祇有憤恨和反感，不再有任何幻想。他們在遭受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之餘，如今正痛定思痛，怨憤莫名，縱被起用，決不致誠心誠意為匪效力。例如偽清華大學的教師，有的覺得「自己是再教育對象，沒資格轉變學員的思想」，因而「只講數理化，不管革命化」，敷衍了事；有的則處於「推一推，動一動」的地位，消極抵抗。又如偽哈爾濱師範學院的教師，認為「當教師，沒有功勞還有苦勞，沒有苦勞還有疲勞，辛辛苦苦却犯了錯誤」，於是得出「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的結論；如今他們則「怕學生難處，課堂難上，教師難當；怕再犯錯誤，怕受批判」，於是「想離開教育戰線，跳出教師隊伍」（註五）。在如此情況下，毛共的「一批二用」政策，顯難收到預期的效果。

毛共與知識份子之間的矛盾既然如此尖銳複雜，彼此的關係是很難改善的，因而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根本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改變，以往是「又利用、又鬥爭」，如今是「邊使用、邊改造」，本質沒有什麼不同。

當然，如果只從表面情勢來看，「紅衛兵」的造反狂潮已經過去了，學校已紛紛「復課」了，知識份子亦已逐漸被起用了；但是，如果從本質上深一層而論，「文革」所要解決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所要消除的矛盾並沒有消除，所要克服的危機並沒有克服，而只有在新的態勢下愈加嚴重的發展滋長起來。這些問題、矛盾、以及危機的存在和發展，對毛共自然有威脅性。在這重重威脅下，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沒有和緩的理由。如果說稍有放寬，則祇是暫時免予武鬥和戴高帽遊大街的侮辱而已。

註一 五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毛共「光明日報」。註二 六十年一月十五日毛共「光明日報」。註三 錢偉長文章於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香港「文匯報」發表，同月二十五日「大公報」轉載。註四 華羅庚文章於六十年二月十三日在香港「文匯報」及「大公報」同時發表。註五 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毛共「光明日報」。